

# “国资充社保”，一颗养老定心丸

## ■一家之言

一系列数据表明，养老金缺口在一些地方存在，甚至缺口较大，亟待修订制度来“补养”。此前，虽然中央及地方也会从央企或地方国企利润中，切出一小块“蛋糕”来充实社保基金，但不过是应急性举措。而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则是在构建一种长效机制。

## □何勇海

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根据方案，从今年开始，国家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2017年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点。2018年及以后，分批划转，尽快完成划转工作。(11月19日《人民日报》)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可谓官方使出的一个惠及民生的大招、好招。近几年，一系列数据表明，养老金缺口在一些地方存在，甚至缺口较大，亟待修订制度来“补养”。此前，虽然中央及地方也会从央企或地方国企利润中，切出一小块“蛋糕”来充

实社保基金，但不过是应急性举措。而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则是在构建一种长效机制。

养老金出现缺口有两个最重要因素。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部分已经参加工作的企业职工没有缴费而视同缴费，他们的养老金实际来自下一代人的缴费。这其实是不公平的。在一些就业职工赡养负担较重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养老金的当期缺口。比如，有的省份人口抚养比高达10:1，即10人养1人。尽快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补养”制度，才能降低企业职工对退休职工的赡养负担。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就是一种比较好的“补养”制度。

导致养老金出现缺口的另一个因素，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据人社部的相关数据显

示，由于东部地区年轻人口较多，缴纳社保的较多，基金结余较多；而中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高，养老基金支出大，则出现亏空。随着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在全国范围内还将不断加大，势必加重国家财政的压力，极大地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渠道，为未来养老金可持续发放创造多一份保障，是当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急切的民生使命。

具体而言，养老保险有了国有资本做后盾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养老金缺口转移给下一代人，减轻下一代人的养老负担。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理应由全民共享。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也是在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做好战略储备，有利于提振全社会的参保积极性和对未来

前景充满信心。正因社保缴费不足以支付养老金支出的情况存在，不少正在缴费的职工担心未来老无所依。而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相当于一颗“定心丸”，让公众的“心病”得以缓解。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管好用好划转专项资金。划转的央企国有股权，由国务院委托社保基金会负责集中持有，单独核算，接受考核和监督。划转的地方企业国有股权，由省级政府设立国有独资公司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也可委托本省(区、市)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的公司专户管理。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管理者无论是谁，都应每年把持有的划转股权价值、分红等信息定期公告，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只有公开透明，才会有使用的规范与效率。

# 公共自行车怎能“一退了之”

## ■试说新语

## □丁慎毅

11月17日，武汉环投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发布《关于武汉公共自行车停止营运的公告》称，目前70余万辆共享单车遍布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已能较好地满足市民短途出行需要，为实现城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经充分论证研究，自2017年11月25日零时起，武汉公共自行车停止营运。公共自行车用户可通过各种方式来退费。

在很多人眼里，公共自行车的退市结局是注定的，是共享单车打败了公共自行车。但问题真就这么简单吗？

不妨对武汉公共自行车的历史做个回溯。2009年，武汉开始在全市密集建设公共

自行车服务系统。最高峰时，建有上千个站点，近10万辆自行车，近100万人办理租车卡。公共自行车成为武汉一张亮丽的名片。2014年4月，有媒体刊发《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投3亿4年瘫痪》一稿，称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采取“政府主导扶持，企业投资运营”的模式，免费批给鑫飞达的户外大屏和全部站点广告牌以及约5000万元项目补贴。仅鑫飞达一家的项目，武汉市投入就超过3亿元。然而4年多的时间之后，却陷入“车辆少、租车难”，部分站点瘫痪荒废的地步。2015年初，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由国有独资企业武汉环投接手。截至2017年3月底，基本实现公共自行车与其他公共交通无缝对接，基本解决交通末端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

这本来是一件利民的好事，至少满足了那些愿意骑公

共自行车的市民的需求，而且又可以在和共享单车的竞争中，倒逼共享单车提供更好的服务，也逼迫自身提高服务水平，群众会由此获得更好的服务。项目突然宣布停止营运，投入如此巨大资金建起的站点、投放的自行车，该如何处理？武汉环投在公告中称，公共自行车停止营运后将进行整体转型升级，为城市智能管理、市民智慧生活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即使如此，也应该有一个转型升级的方案让市民听证讨论，毕竟这是国有资产。如果转型升级不成功，这个巨大的浪费和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该由谁来负责？

由政府主导扶持的公共自行车，比共享单车进入市场早了7年，天时地利人和都优于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进入市场，虽然不应该有政策歧视和限制，但至少应该让彼此公平竞

争，而且公共自行车还可以借鉴共享单车的长处从而实现管理服务的升级，现在就这样拱手让出市场，真的不心疼吗？

进一步说，随着悟空单车、3Vbike、小蓝单车倒闭，叮叮单车“跑路”，酷骑单车陷入押金风波，当资本市场不再对共享单车热衷，共享单车品牌将很难再获得融资。随着整个共享单车领域的洗牌，而摩拜、ofo合并的声音不绝于耳，将来用户在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会越来越难有选择权。如果最后市场上就只剩下一家而形成垄断，那时候再来发展公共自行车，是不是又要再折腾一番？

对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公共自行车来说，武汉或许就是一个风向标。公共自行车向何处去，似乎不能仅仅止于一个公告。是进是退，正在考验有关部门的智慧。

## ■媒体视点

## 泄露学生隐私

## 是无奈还是懈怠

国家奖学金获奖名单网上公示，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据报道，不少高校近几年在公示国家奖学金候选人或获得者名单时，均披露了学生完整的身份证号。有学校表示，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做法，“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学生的隐私”。

在信息游走的链条上，实在是有关方面务求精准到位，杜绝冒领虚支，这就要求公民的个人信息尽可能全地被集纳；另一边，持有这些信息的机构、单位并未尽到保护个人隐私的职责。

如某高校相关负责人所言，“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似乎只能如此。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懈怠。就像有些高校已经在做的那样，对身份证号进行打码，或者只公布学号等同样具有唯一性的信息，实践证明并未影响到公示效果。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除非经权利人同意或者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也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的信息不予公开。

任何单位及个人的任何行为，均应以法律为边界和底线，而不能动不动就去搞一些特殊的实操手册。高等院校也好，事业单位也好，行政机关也罢，大都并不是没有好办法来合理地保护个人隐私。对此，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具体而言，不妨要求包括高校在内的单位、机构对官网进行普遍性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先解决燃眉之急。从长远看，则应设法厘清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的边界，既要推动公开透明，又要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这二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主动作为。

(摘自光明网)

# 对无证幼儿园，助其“转正”才能多赢

## ■公民论坛

## □李英锋

11月14日，北京市教委网站公布7部门联合印发的《北京市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试行)》，同时在印发通知中提出，设立一批接收3-6岁儿童进行保育和教育的社区办园点。通知要求，对条件较好的无证幼儿园给予支持和帮助，创设条件使其符合社区办园点的要求，并对社区办园点的举办者加强管理和引导，规范其行为。(11月19日《新京报》)

城市幼儿园的供需矛盾由来已久。一方面，正规幼儿园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孩子们的入园需求，存在着“入园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无证幼

园遍地开花，难以取缔，存在着“监管难”的问题。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民众对幼儿园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依然坚持原来的幼儿园管理模式，上述矛盾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而引导、鼓励、支持条件较好的无证幼儿园“转正”，转为门槛较低的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可以有效缓解幼儿园的发展矛盾和监管矛盾，实乃多赢之举。

设立正规幼儿园有一套政府制定的严苛标准，对办园规模、师资力量、硬件设施等的要求较高，很多民办“幼儿园”难以达标，难以通过审批。正规幼儿园的缺位给无证幼儿园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在大城市，无证幼儿园数量不少，且分布较广泛。收费较低，有的无证幼儿园已存在多年，这些幼儿园实际上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幼教功能，也

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民众的入园需求空白，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平心而论，要全面彻底取缔无证幼儿园会遇到很大阻力，不太现实，而让无证幼儿园长期处于“黑户”状态，凸显监管的尴尬。

政府部门转变管理思维，推出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模式，对社区办园点在场地、设施、人员等方面放宽标准，给无证幼儿园开辟了一条可行的规范发展之路，“达标”对一些无证幼儿园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无证幼儿园在改造完善后就可以成为正规的社区办园点，堂堂正正地招生，堂堂正正地开展教育活动。无证幼儿园的“转正”可以堵住幼教市场的部分漏洞，减少幼教市场的风险和隐患，可以规范幼教市场的发展，向民众提供更多达标的幼教资源，让民众拥

有更多正规幼教机构选择权。同时，将一些具备条件的无证幼儿园“转正”，也可以降低教育等部门的监管压力，减少监管风险，提升监管的效率。

比之用苛刻标准将很多无证幼儿园拒之正规幼教市场的审批大门外，又无奈地面对无证幼儿园长期生存的现实，政府因势利导，调整政策，放宽审批标准，让更多无证幼儿园有机会“转正”，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无疑更务实，更具科学性、合理性，更符合实际，更贴近民众需求和管理需求。期待北京进一步探索无证幼儿园有条件“转正”的经验，蹚出一条新路，用无证幼儿园“转正”这把钥匙开一开“入园难”的矛盾之锁。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